

无聊耻行

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

闻畦之 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胡适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大师，但无名士气，光风霁月大度包容，不欺暗室真诚待人，一生从不「害人」或「防人」，绝不曾在无聊、无耻、无行的龌龊之中，堪称最近人情的人。这是胡适最令人佩服最望风景仰，望尘莫及的地方。

无聊 无耻 无行

胡适的
人际世界揭秘

闻畦之 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聊无耻无行: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闻畦之编.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10

ISBN 7-5057-2051-1

I. 无… II. 闻… III. 胡适(1891~1962)-人物研究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929 号

书名	无聊无耻无行——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
著者	闻畦之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332000 字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2051-1/C·310
定价	24.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序

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沉寂许久后，近年来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解除了过去对胡适的禁忌；胡适本身的历史地位和具有的文化魅力，是受世人瞩目的亮点，1990年胡适日记及档案材料的公开，胡适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

细看与胡适一生行状有关的文字，他在无聊、无耻、无行的“三无”遍地的世界，是“三无”皆缺的书生；一辈子没有“害人”也从不“防人”，成为民国史上的“世说新语”式的佳话，这很值得人们记取和效法。因此，编著《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无聊无耻无行”》，以填补胡适相关研究书籍在这方面的空白。

作者以放大格局而力求公正、实事求是而不加掩饰的态度，将胡适与各界风云人物的交往为纬，用胡适的思想、人格、品德为经，展示其人际交往的生活画卷，构造出了解胡适，进而了解现代中国风云政治的雅俗共赏的平台。该书在人情冷暖上面，力求鲜活，给读者以警世醒世的震荡。

目 录

序.....	(1)
正是至情似无情——毛泽东与胡适.....	(1)
和而不同金石交——胡适与李大钊.....	(37)
“两个反对的朋友”——胡适与陈独秀.....	(55)
同床异梦三十年——胡适与蒋介石.....	(76)
聚散离合文武交——胡适与李宗仁	(134)
心照神交毕生友——胡适与蔡元培.....	(146)
启发商榷忘年谊——胡适与梁启超	(174)
始合终散两大师——胡适与鲁迅	(190)
忽冷忽热生死友——胡适与周作人	(222)
相亲相重两巨公——胡适与林语堂	(243)
慧眼识才才感恩——胡适与沈从文.....	(260)
“五四”文学百年情——胡适与冰心.....	(273)
君子之交淡如水——胡适与梁实秋.....	(284)
亦师兼友自风流——胡适与傅斯年	(293)
云龙契合真罕见——胡适与李敖	(312)
隔行隔山不隔心——胡适与顾毓琇.....	(341)
煦煦春阳大师情——胡适与罗尔纲	(352)
杏坛异彩亦传奇——胡适与吴健雄	(359)
师生情谊大互动——胡适与王云五	(374)

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

“雷案”前后两同道——胡适与雷震·····	(389)
一面如旧布衣交——胡适与芝麻饼小贩袁彪·····	(407)
文人论政报国志——胡适与张季鸾·····	(411)
生离死别在北平——胡适与他的儿子胡思杜·····	(418)
恋情难敌盛名累——胡适与恋人曹珮声·····	(427)
至真至诚最珍贵——胡适与毛彦文·····	(442)

正是至情似无情 ——毛泽东与胡适

毛泽东 1893 年 12 月 26 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胡适 1891 年出生于上海清廷官吏之家，留学美国，弃农学文，是现代中国所谓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的代表性人物，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参政议政者。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分别是不同道路上的领军人物，可是在“五四”时代，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学生及他的热烈崇拜者。毛泽东一生都没有忘记胡适对他的教导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二人的来往，以及思想上、政治上的联系、分歧和斗争在中国现代史留下深刻的痕迹，折射出绚丽多彩的历史风云画卷，给予世人关于中国政治的思考。

毛泽东说 30 年代： 胡适“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毛泽东认识胡适，始于拜读《新青年》杂志。《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6 年 9 月第 2 卷起改名《新青年》)创刊后，杨昌济先生订了几份送给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毛泽东是受赠送者之一。

从此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描述当年的情景说，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当时的《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迷信与独裁，他完全同意这些观点。”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易卜生主义》等文章，使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936 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追忆往事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还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1917 年 9 月 23 日，张昆第的日记云：“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陈旧布新之谓。”由此可见，毛泽东深受陈独秀和胡适的影响，其思想乃至语言都明显带有脱胎于《新青年》的

痕迹。

毛泽东与胡适的交往，是从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开始的。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对此，胡适晚年回忆说：“章行严是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8块钱，那时8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萧三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写道：“当时文艺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泽东仰慕他们。杨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的几个人，记得我随同拜访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据胡适晚年同他的秘书胡颂平谈话：“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京，他和5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的内容胡适没有谈，信也没有保存。胡适说，他曾将此信交给他人保管，抗战期间，此人怕生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居京半年多，经沪返湘之后，很快投入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7月14日创办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明显地受陈独秀、胡适所办《每周评论》的影响，呼应的地方不少。《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讲浩浩荡荡的新思潮，“见于思想方面”的，就列举了“实验主义”，这是对胡适所宣传的“实验主义”的一个反映。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评述东方大事，写《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胡适那时在青年人心目中，包括在毛泽东心目中，恐怕也属于“思想界明星”。

《每周评论》对《湘江评论》的出版，多有誉词。胡适在“新书评价”栏中，作了热情高度的评价，称之为“我们新添的小兄弟”，

肯定议论是其长处。赞扬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是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认为“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

这段文字既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与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

他们当时在政治思想上具有要求平等自由、反对封建统治的共识，所以 1919 年 8 月 31 日《每周评论》遭到北洋军阀无理封闭。9 月间，毛泽东便在他刚刚接办的《新湖南》周刊的第 7 号上发表了《哭〈每周评论〉》一文，对反动军阀的残暴行径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对横遭扼杀的《每周评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说明他们之间在反对封建军阀上是心心相印的！

1919 年 7 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8 月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胡适的文章，提出研究问题离不开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响应胡适，于 9 月 1 日拟订了《问题研究章程》，10 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章程》洋洋洒洒列举了 140 多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章程》只是一纸章程，并没形成组织和开展活动，可是从其基本思想和所要研究的问题看，是明显地受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李锐在《五四运动中的青年毛泽东》一文中说，它“很可能是受了胡适在文中所提的‘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这类说法的影响”。由此可见，毛泽东受胡适影响之深，在当时的确胜过李大钊的影响。

毛泽东第二次赴北京时，自知“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于是多次拜访胡适，继续向胡适请教人生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有志青年为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出国留学，但毛泽东则认为求学实在没有必要非得“出洋”不可，“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先生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由此说来，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有自己的理由，要着重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党史专家对此也有更详尽的解释。而胡适的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与胡适的赞同、支持密不可分。

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曾就办学的目的和初步的计划，向胡适做了透露，并征求了胡适的意见。

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毛泽东则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各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选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叫作‘工读互助团’。”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筹备的“工读互助团”是表示赞同和支持的，并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

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意见有所不同,但毛泽东对胡适所提出的切实意见很重视。在拟定章程时,采纳了胡适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成明确的条文。

同时,由于胡适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评论“工读互助团”与“自修大学”的文章,在舆论上造成了影响,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创办自修大学的消息广泛传开后,当时的《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纷纷发表评论。蔡元培不仅为自修大学题词,还撰写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对湖南自修大学做出有利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极高的评价。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所创办的业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自修大学策划者胡适的赞赏。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毛泽东第二次离开北京回湖南后,曾办起文化书社。这是一个以传播新文化书刊为宗旨的书店。文化书社《营业通告》所列举的重要书籍,有胡适做译员的杜威演讲集,还有胡适的《尝试集》《短篇小说》《中国哲学史大纲》。

可见五四期间,毛泽东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且曾经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当时仰视胡适为自己的“楷模”。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追忆往事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

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还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那时，毛泽东从事的一些革命活动，或向胡适请教，或征求胡适的意见，或得到胡适的支持，或受胡适思想的影响。

当时毛泽东对胡适是很尊重的。这从毛泽东在1920年7月9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信中说：“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按：指军阀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这是一张明信片，为胡适存件，编字1584号。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毛泽东与胡适的关系是密切的。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前人在曲折的历史道路上所遗留下来的足迹！

1921年前后，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事建党活动以来，毛泽东同胡适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了。在胡适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形成了代表所谓自由主义的“月党”。

但是，政治立场不同，并不意味着不能团结和合作。毛泽东是最早从政治思想上，对前期的胡适做出认真评价的人。

1923年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出版的《新时代》第1卷第1号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称胡适为“非革命的民主派”，属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民主派”，指出他既有非革命的一面，又有民主性的一面。期望他们在反动派的压迫下转向同革命的民主派合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看来，当时毛泽东所做出评析是较客观的，合乎胡适的思想实际。

胡适当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的历史观,一是阶级斗争说,前者“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而后者“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需有的惨剧。”

这里可看出,胡适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他“非革命”的一面。同时,他又是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改良社会,争取民主自由,因此他又具有进步的一面。所以,毛泽东对胡适这一类的“非革命的民主派”是采取争取、团结的策略,而不是以排斥打击的态度,一味的与之展开斗争。

对“非革命”的胡适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寄予期望的,不仅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收入1922年12月15日发表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上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

周在文中称“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但对胡适近来在《努力》上发表的政论表示非常失望。周的结论是:“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但又说,胡先生说过“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我们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

毛与周,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法国,对“非革命”的胡适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期望。这恐怕代表了对新文化运动明星胡适有过

敬仰之情的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当时共有的期望。

但是,共产党人这种带有一厢情愿性质的期望落空了。国民党“清共”“剿共”以后,胡适尽管同国民党也有过齟齬,其根本的政治立场,是明确地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不可能说胡适的好话,这是很自然的。“文化班头博士街,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这是1933年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痛斥胡适的一首杂文诗。鲁迅帮他化名发表,并把它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以广流传,这很能代表那时左派对胡适的态度。

至于以后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毛泽东书信选集》收有1936年9月给蔡元培的长信。一开头就回忆旧交:“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然后提出: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日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袞袞诸公或则日不可行,或则日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最后归结到寄希望于蔡先生“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

信尾列了一个从宋庆龄到舒新城共70人的名单,“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这个名单中,当然不能没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中毛泽东结识的“学术师友”胡适之。

毛泽东 40 年代：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长

同中间派合作，是毛泽东早年民众大联合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尖锐的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矛盾的缓和，党派之间的斗争已处于次要地位，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民族统一战线广大了，除了叛国投敌分子之外，都是团结争取的对象。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没有对胡适有任何非议之处。而是对胡适在五四时期所做出的业绩曾不止一次的加以积极的肯定。

1939 年 2 月，毛泽东有三封长信给陈伯达，对他所写关于诸子哲学的论文提意见，强调要坚持两分法，有肯定，有否定。信中说：“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和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作者注：章，是章太炎，梁，是梁启超，冯，是冯友兰，胡，就是胡适）毛泽东要求作者申明：“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毛泽东在 1940 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

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又如，毛泽东在1942年所发表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胡适名显然列“一班新人物”之中。

说明毛泽东对胡适的肯定方面的事例，还可以举出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编印的《文化课本》。这课本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几位同志编的，毛泽东写了序，两册78课中，有一课是胡适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也讲到了胡适。这是《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提供的信息。那是在毛泽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党的老干部要尊重抗战时入党的大批新干部，不要使他们感到老干部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是胡适的名言，见之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尝试集）自序》，说的是不用典故、不用套语、不重对偶的白话文和白话诗。毛泽东在此显然别作他解。不是讲如何写白话，而是讲要让人家没有顾虑地说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信手拈来，一下就拈出胡适的一句话，可见毛泽东对早年读过的胡适的一些话之深刻。

1945年初，面对战后民主建国的重大问题，由于胡适的所谓自由主义大师和国际著名学者、驻美大使的身价和他的社会地位，在大战即将结束，国共将争雄的特殊情况下，成为国共两大政治集团都关注的一股最大的知识界的力量的代表，国共双方都看中了他，并展开了对他的争取。把他视为一种道义的力量